

## 從《臺北人》到《父親與民國》 看白先勇的離散情懷

林 桶 法\*

### 摘 要

白先勇的《臺北人》，著重 1949 年前後來臺一群人的際遇。白先勇大部分以文學作品為主，2012 年出版《父親與民國》則是歷史論著，著重其父親個人的事蹟，實際上也是大時代的關懷。本文主要分為兩大部分，其一，從《臺北人》探討白先勇眼中的「外省人」的際遇，國共內戰帶來的分離，特別是 1949 年的逃難，使許多人遠離故鄉，甚至再也沒能回家，這些經歷離散的人，有特定的歷史記憶，並有其時代性，這些特質經由白先勇的筆將之反應出來，然而這些記憶是白先勇的記憶還是這批離散者共同的記憶值得論述。其二，以《父親與民國》論述白先勇筆下的父親，分析該書出版的意義與貢獻，白先勇重感情，對親人、對鄉里、對國族有一份濃濃的鄉愁與國愁，更重要的是對其父親一生的評價，雖其沒有特別提到「平反」，但從其在臺北、廣西、北京的新書發表會及學術研討會，全程參與，認真地與記者、學者、聽眾對話過程，並多次在不同的場合推薦該書，確實能感受其對這本書的重視。本文希望藉由這樣的敘述，讓更多人對這些經歷過離散的族群有一份同情的理解。

**關鍵詞：**白先勇、白崇禧、臺北人、父親與民國、離散

---

\*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017307@mail.fju.edu.tw)

投稿日期：2016.11.28；接受刊登日期：2017.03.12；最後修訂日期：2017.06.09



## 一、前言

歷史的敘述由研究者進行歷史的書寫，較能客觀的闡釋歷史的情境，但缺乏一份感情，由親人書寫相關的歷史，雖較為主觀，多了一些情懷，可能較能掌握傳主的精髓。各有其優缺點，最主要的視撰者是否敢於面對親人或自身過去的歷史。

民國的歷史上人民歷經許多的顛沛流離，戰爭不斷是民國史的特點之一，每一次的戰爭都會帶來許多的離散。「離散」(Diaspora)，英文又譯為「流散」，源於希臘詞彙，有橫穿、分離之意，亦有種子及散播種子之意。有時意指植物繁衍，種子或者花粉的播撒、飛散。甚至有些認為從原鄉散居到兩個以上的地方，<sup>1</sup>所以可以譯為散居、流散或者離散。離散在人類的生活中心，是一種不分古今中外，由來已久的現象。因為人是一種需要聯結與歸屬的動物，偏偏在生命中我們除了與其他人、事、時、地、物締造聯結與歸屬，也可能會因為各種原因，或被迫、或自願地割捨這些與自身相連的牽絆，這便形成了生命中的離散；離散的對象可能是親人朋友、可能是國家故鄉，甚至是對於自我及生命的迷失。

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的特徵之一，戰爭帶來破壞與再生，更造成許多人流離失所，然也孕育出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臺灣許多經歷離散的文學家，如張大春的《聆聽父親》，<sup>2</sup>該書是張大春的家史，是寫給父親和孩子的家書，也是張大春第一次邊寫邊哭的小說。張國立的《戰爭之外》，<sup>3</sup>提到戰爭帶來死亡、帶來家庭的毀滅破碎，企圖尋訪那段戰火歲月裡的

---

<sup>1</sup> 離散的定義綜合李有成，《離散》(臺北：允晨文化，2013年)，頁17；林鎮山，《離散·家國·敘述——當代小說論述》(臺北：前衛出版社，2006年)，頁12-16。楊慧，《白先勇離散文學創作中的身分認同問題》(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頁3。安璐，〈離散文學與身分認同問題——以白先勇小說為例〉，《明日風尚》2016年期24(2016年12月)，頁304。

<sup>2</sup> 張大春，《聆聽父親》(臺北：時報文化，2003年)。

<sup>3</sup> 張國立，《戰爭之外》(臺北：印刻出版社，2016年)。

真相與故事。苦苓的《外省故鄉》<sup>4</sup>內含〈柯思里伯伯〉等七篇短篇小說，主要探討臺灣第一代與第二代外省人的境遇與心情。其他還有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家，如張啟疆、孫瑋芒、愛亞、蘇偉貞等，他們各自寫出眷村文化的特質。

離散自近代以來已成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有時是離開原居的地方，有時是離開故土的親人，時間長短不一，有時離散後能再落葉歸根，回到原居的鄉里，如抗日戰爭，許多人因為戰亂、災荒的逃難，但終究可以回到原鄉。國共內戰帶來的分離，特別是 1949 年的逃難，使許多人遠離故鄉，甚至再也沒能回家，因此歷經一甲子之後，臺灣出現大量的作品追述這失去的歲月，許多人從歷史、文學及思想的角度探索國共內戰帶來的影響。<sup>5</sup>

1949 年對某些人而言是句點，對某些人是破折號，對一些人而言則是起點。分離兩岸對大多数人而言，不是選擇而是被選擇，或許經歷流離比留在原鄉更為精彩，但如果讓每一個人去選擇，大多不會選擇流離的歲月。那是無奈的時代，有些人用生命寫歷史，有些人認為該被記載，白先

---

<sup>4</sup> 苦苓，《外省故鄉》（臺北：希代出版社，1988 年）。

<sup>5</sup> 文學作品如：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臺北：天下雜誌，2009 年）；齊邦媛，《巨流河》（臺北：天下文化，2009 年）等。史學論著如：林桶法，《1949 大撤退》（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 年）；劉維開，《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臺北：時英出版社，2009 年）；李敖，《大江大海騙了你：李敖祕密談話錄》（臺北：李敖出版社，2011 年）；曾健民，《1949·國共內戰與臺灣》（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 年）等。思想層面方面有：楊儒賓，《1949 禮讚》（臺北：聯經出版社，2015 年）；錢永祥編，《一九四九：交替與再生》，《思想》期 13（2009 年 11 月）。紀錄片及電影方面，如：丁雯靜、游本嘉等《1949 大遷徙》（紀錄片）；沈時華編，《瑰寶 1949》（公視：戲劇）；《老兵日記：1949 勸山河》（紀錄片）；《我在 1949 等你》：陳明章導演（電影）；《驚濤太平洋：1949 東方鐵達尼號沈船之謎》（紀錄片）；公共電視公關組／潘怡豪，《1949 前後的中國》（紀錄片，2011 年）；國史館，《存亡關頭——1949 年的中華民國》（紀錄片，2009 年）；吳宇森執導，《太平洋：驚濤摯愛》（電影，2014 年）等。

勇、龍應台、齊邦媛等，或許就是在這樣的情懷下，寫下其論著，本文僅以白先勇為題作論述。

白先勇<sup>6</sup>是小說家、散文家、戲劇家，著作極豐，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臺北人》，長篇小說《孽子》，散文集《驀然回首》、《明星咖啡館》、《樹猶如此》，舞臺劇劇本《遊園驚夢》、電影劇本《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玉卿嫂》、《最後的貴族》、電視劇本《一把青》等。2014年，臺大邀請白先勇回母校開設《紅樓夢》導讀通識課，2016年更出版《白先勇細說紅樓夢》，<sup>7</sup>白先勇的細說，除了體大思精的掌握全書真意，更在一字一句、一段一落中，處處現出其中個別呈露的微妙涵義。關於白先勇文學創作的研究，兩岸均不斷有學者投入，從不同的角度書寫，形成白先勇文學經典化的現象。白也投入戲曲，製作《青春版牡丹亭》巡迴兩岸、美國、歐洲，獲得廣大迴響。看似從文學到戲曲，但作品中充滿著歷史的關懷。

《父親與民國》<sup>8</sup>是其致力撰寫父親白崇禧傳記的一部歷史著作。該書分上下兩冊，上冊為《戎馬生涯》，分〈北伐〉、〈蔣桂戰爭·建設廣西〉、〈抗戰〉、〈抗戰勝利·國共內戰〉四章；下冊為《臺灣歲月》，分〈臺灣歲月〉及〈家族親情〉兩章。全書收錄約600張白崇禧將軍的珍貴影像、報導剪影，並由白先勇撰寫圖說及一篇篇小故事。全書洋溢著深刻雋永的父子情，更有許多還原歷史現場的珍貴畫面與史實追記。

---

<sup>6</sup> 白先勇，1937年生，廣西桂林人。臺大外文系畢業，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文學創作碩士。幼年居住於南寧、桂林，1944年至重慶。抗戰勝利後曾移居南京、上海、漢口、廣州。1949年遷居香港，1952年來臺與父母團聚。1963年赴美留學、定居，1965年獲碩士學位，赴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系任教中國語言文學，1994年退休。1997年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圖書館成立「白先勇資料特藏室」，收錄一生作品的各國譯本、相關資料與手稿。近幾年來除關心崑曲的發展外，整理出版《父親與民國》，並舉辦一序列的學術討論會。

<sup>7</sup> 白先勇，《白先勇細說紅樓夢》（臺北：時報文化，2016年）。

<sup>8</sup>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全2冊）（臺北：時報文化，2012年）。

探討白先勇離散情懷者甚多，如洪珊慧等作品，<sup>9</sup>本文主要因為《父親與民國》的出版，希望以史學來對比文學。本文主要分為兩大部分，其一，從《臺北人》探討白先勇眼中的「外省人」的際遇；國共內戰帶來的分離，特別是 1949 年的逃難，使許多人遠離故鄉，甚至再也沒能回家，這些經歷離散的人，有特定的歷史記憶，並有其時代性，這些特質經由白先勇的筆將之反應出來，然而這些記憶是白先勇的記憶還是這批離散者共同的記憶值得論述。其二，以《父親與民國》論述白先勇筆下的父親，分析該書出版的意義與貢獻，特別討論白崇禧在國共內戰時的角色。白先勇重感情，對親人、對鄉里、對國族有一份濃濃的鄉愁與國愁，更重要的是對其父親一生的評價，雖其沒有特別提到「平反」，但從其在臺北、廣西、北京的新書發表會及學術研討會，全程參與，認真地與記者、學者、聽眾對話過程，並多次在不同的場合推薦該書，確實能感受其對這本書的重視。

這兩本書有其脈絡可循，主要是白先勇對時局變化與父親際遇的感懷，白處於變動中，看到父執輩從大陸到臺灣的際遇，先以小說的方式呈現，集結許多人的共同記憶，書寫出許多人對故土的情懷與人生變化的無常。再以對父親在民國的貢獻，對比於臺灣時期的落寞，多少有些感傷，本文希望藉由這樣的敘述，讓更多人對這些經歷過離散的族群有一份同情的理解。

---

<sup>9</sup> 洪珊慧，〈從「臺北人」到「紐約客」：白先勇筆下的離散與城市〉，《城市文化與人文視野》第二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出版，2009年），頁 51-85。洪珊慧，〈《家變》與《孽子》中的父子關係與對「真實」世界的追求〉，《臺灣文學研究學報》期 12（2011年4月），頁 189-204。林幸謙，〈生命情結的反思——白先勇小說主題思想之研究〉（臺北：麥田出版社，1994年）。楊慧，〈白先勇小說中的民國歷史〉，《文學界（理論版）》2011年期1（2011年1月），頁 181。林家綺，〈華文文學中的離散主題：六、七〇年代「臺灣留學生文學」研究——以白先勇、張系國、李永平為例〉（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楊佳嫻，〈論戰後臺灣外省小說家作品中的「臺北／人」〉（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 二、《臺北人》文學作品中的歷史關懷

有關白先勇的研究已多如牛毛，有專書、有碩博士論文、有期刊等，如符立中，《對談白先勇》等作品。<sup>10</sup>有些大陸地區的博碩士論文，著重於與外國小說的比較，如華翔，《白先勇與喬伊斯的孤獨意識比較》<sup>11</sup>，白先勇的《臺北人》和喬伊斯的《都柏林人》，內容上有極大的相似性，兩部作品都以作家所生活過的一個城市為背景，生動地描繪各自所處的時代與環境下特定城市群體的人生百態，光怪陸離的城市生活，形形色色的城市人物，以及每個人都難以忘懷且訴說不盡的城市記憶，進而表現博大的人生與歷史主題。兩位作家站在歷史的、哲學的、社會的高度，以敏銳的洞察力深刻地剖析時代的、民族的精神狀態與具有現代色彩的城市人物情感。尤其是《臺北人》和《都柏林人》在描寫這些城市群體以及他們複雜的人生與命運時，都關照這些特殊的文化類群所特有的一種孤獨感，揭示了形成他們這種孤獨的歷史的現實的精神根源。又如宋芳，《白先勇與太宰治作品中悼亡貴族情結的比較》<sup>12</sup>，以白先勇和太宰治（1909-1948）<sup>13</sup>作比較，兩人出身飽學之家，童年時期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青少年時

---

<sup>10</sup> 符立中，《對談白先勇：從臺北人到紐約客》（臺北：現代出版社，2015年）。游淑靜，〈無可奈何花落去——白先勇筆下的臺北人〉，《出版之友》期5（總號47，1989年6月），頁70-77。何田田，〈論「臺北人」的人物和主題〉，《文藝月刊》期76（1975年10月），頁21-28。鄭斐文，《白先勇「臺北人」的敘事手法》（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楊馥菱，〈歷史記憶的召喚與國族認同的消解——評白先勇的《臺北人》〉，《成功大學中文學報》期7（1999年6月），頁131-149。

<sup>11</sup> 華翔，《白先勇與喬伊斯的孤獨意識比較》（無錫：江南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喬伊斯為愛爾蘭作家，代表作包括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1914年）、長篇小說《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1916年）、《尤利西斯》（1922年）等。

<sup>12</sup> 宋芳，《白先勇與太宰治作品中悼亡貴族情結的比較》（瀋陽：遼寧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

<sup>13</sup> 太宰治，日本青森縣人，其父親源右衛門是松木家的入贅女婿，也是縣議員、眾議院議員，經營銀行與鐵路，並因多額納稅而成為貴族院議員，是地方名紳。1948年6月13日深夜與山崎富榮跳玉川上水自殺，得年39歲。代表作品包括《惜別》（大阪：朝

期恰逢亂世，國勢衰微，家國命運繫於一體，家族沒落。這些經歷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打下深刻烙印。二人文本中呈現出緬懷過往輝煌、悼念昔日歲月。二人的貴族悼亡情結有著極其相似之處，從出身到際遇，貴族的身世背景對二人文學作品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此後二人人生際遇的不同也使他們小說風格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特別他們的文中多出現失意的破落貴族、迷惘的知識分子、在舊道德重壓下的女性以及遊子心情。

除了不同的比較之外，也有研究白先勇作品者，亦有以《臺北人》為分析者，最經典者為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山口守，〈白先勇小說中的現代主義——《臺北人》的記憶與鄉愁〉、鄭樹森，〈白先勇「遊園驚夢」的結構和語碼——一個批評方法的介紹〉、思兼，〈白先勇「臺北人」的世界〉等，<sup>14</sup>從不同角度去解讀。在眾多作品中進行研究，其實有難度，但由於白先勇《父親與民國》的出版前後，筆者曾參與白先勇舉辦的多次學術研討會，並曾撰寫〈戰後蔣介石、白崇禧關係的探討（1945-1950）〉等文<sup>15</sup>，因此擬將視角從文學拉回歷史的場景。

臺灣地區（含地域上的澎湖與蘭嶼）最早居住一些南島語系的原住民，從 16 世紀中葉以後有大批的漢人因為經濟原因到臺灣移墾，這批移墾者以福建省（閩南）及廣東省（客家）為主，1949 年左右有許多大陸居民（外省人）來臺，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四大族群構成臺灣主體，這些外省人中雖以福建、浙江、江蘇省、山東省居多，但大陸各

---

日新聞社，1945 年）、《斜陽》（東京：新潮社，1947 年）、《人間失格》（東京：筑摩書房，1948 年）等。

<sup>14</sup> 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臺北：爾雅出版社，1983 年）；山口守，〈白先勇小說中的現代主義——《臺北人》的記憶與鄉愁〉，《臺灣文學學報》期 14（2009 年 6 月），頁 1-17；鄭樹森，〈白先勇「遊園驚夢」的結構和語碼——一個批評方法的介紹〉，《中外文學》卷 8 期 4（1979 年 9 月），頁 50-61；思兼，〈白先勇「臺北人」的世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卷 7 期 11（1974 年 11 月），頁 49-52。

<sup>15</sup> 林桶法，〈戰後蔣介石、白崇禧關係的探討（1945-1950）〉，《國史館館刊》期 35（2013 年 3 月），頁 81-110。

省都有，職業以軍人最多，其他公教人員、民意代表及其他行業都有。戰後至 1950 年初期來臺的外省人約 120 餘萬人，追究其來臺的原因甚為複雜，政治、經濟、社會及個別因素皆有，結構甚為多元。楊儒賓在《1949 禮讚》一書中提到：

從大陸逃難到臺灣的知識分子有兩種人：一是文化傳統主義知識分子，如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一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胡適、傅斯年、殷海光、梁實秋等，這兩系人物的思想頗有交集。事實上，自由主義者所標舉的民主與自由理念相當程度上已成為當時人們的共識；文化傳統主義可說無人不擁戴之，而且被視為儒家在當今社會最需堅持的理想目標。文化傳統主義與自由主義理念日漸成為臺灣文化最核心的價值。<sup>16</sup>

這些所謂的「外省人」分布在臺灣各地，其中又以臺北地區最為重要，中華民國政府正式遷都臺北，中央民意機關以臺北為中心，1950 年代臺北地區「外省人」人數為全省之冠，在當時思鄉的情緒下，臺北市街道充滿著大陸地區的縮影，從民生的食衣住行，甚至街道的名稱，文化活動亦充斥大陸情懷等。白先勇的《臺北人》與此大環境有極大的關係。

白先勇父親白崇禧，為桂系出名將領，素有小諸葛之稱，白先勇反應靈敏，學思豐富，可能與其背景有關。白先勇文學創作相當豐富，其中《臺北人》為其著名作品之一，集結 1960 年代在《現代文學》期刊上發表過的作品，最早版本由晨鐘出版社於 1971 年出版。<sup>17</sup>共收錄十四篇短篇小說，分別是：〈永遠的尹雪艷〉、〈一把青〉、〈歲除〉、〈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思舊賦〉、〈梁父吟〉、〈孤戀花〉、〈花橋榮記〉、〈秋思〉、〈滿天裏亮晶晶的星星〉、〈遊園驚夢〉、〈冬夜〉、〈國葬〉。每篇各自獨立、篇幅長短不一、寫作技巧與

---

<sup>16</sup> 楊儒賓，《1949 禮讚》（臺北：聯經出版社，2015 年），頁 58-59。

<sup>17</sup> 袁良駿，《白先勇論》（臺北：爾雅出版社，1991 年），頁 391。

形式也不盡相同，唯其各篇內容題材有一共通性，即描繪 1949 年以來中國大陸遷徙來到臺灣的人物、生活，藉由這些故事中的大陸出身者，在臺灣拖曳著過去記憶而生存的故事，貫穿從民國至戰後臺灣的歷史記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失落感與鄉愁，並對臺灣的社會現實，多層次地描繪。<sup>18</sup>

《臺北人》書中的主要角色，有兩大共同點：第一、他們都出身中國大陸，並且都是在大陸淪陷之後，隨著政府撤退來臺。離開大陸時，他們大多是青年人或壯年人；二十年後在臺灣，他們已是中年人，或已邁入老年。第二、他們都有過一段難忘的過去，而這過去的重負，直接影響到他們目前的現實生活。這兩個共同點，便是將十四篇串連在一起的「表層鎖鏈」。<sup>19</sup>《臺北人》中所出現的角色，來自中國大陸不同的省籍或都市，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等。他們貧富懸殊，行業各異，但沒有一個不背負一段沉重的、斬不斷的往事。而這份記憶，或多或少與民國成立以來面臨的種種憂患有直接關係。

這份關懷在許多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作家，都能感受得到，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頁首就提到：「他們曾經意氣風發，年華正茂，有的被國家感動、被理想激勵，有的人被貧窮所迫，被境遇所壓。……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sup>20</sup>卷末的後記中又提到：「有幸能和我的同代人這樣攜手相惜，一起為我們的上一代——在他們一一轉身、默默離去之前，寫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們致敬。」<sup>21</sup>王鼎鈞在《關山奪路》出版之後提到：

---

<sup>18</sup> 山口守，〈白先勇小說中的現代主義——《臺北人》的記憶與鄉愁〉，《臺灣文學學報》期 14，頁 10。

<sup>19</sup> 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頁 5-6。

<sup>20</sup>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臺北：天下文化，2009 年），卷首。

<sup>21</sup>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後記。

我不是寫我自己，我沒有那麼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識，反映一代眾生的存在，希望讀者了解、能關心那個時代，那是中國人最重要的集體經驗。<sup>22</sup>

經歷過時代的人才能寫下真正感人的詩篇，白先勇、龍應台、王鼎鈞等著名的文學家，本身就是時代的題材。

我想「臺北人」對我比較重要一點。我覺得再不快寫，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種已經慢慢消逝的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馬上就要成為過去，一去不復返。<sup>23</sup>

書名雖為《臺北人》，故事中的空間在臺北，但文中充溢著懷鄉與對中國的思念，白先勇在書中引錄的唐詩——劉禹錫〈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sup>24</sup>作家歐陽子指出，《臺北人》中的主角一個是「過去」，另一個是「現在」，而這個「過去」可以代表中國傳統、舊式的、階級秩序的、大氣派的文化象徵，「現在」則是失落的、複雜、失去靈性的現代工商業社會。<sup>25</sup>

《臺北人》中的人物囊括各個階層，白先勇也認為其筆下的人物不是只有貴族，有更多底層的撰寫；如〈永遠的尹雪艷〉中的社交名媛尹雪艷，〈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中的舞女金兆麗，〈梁父吟〉下年邁挺拔的儒將樸公，也有〈歲除〉中的士兵賴鳴升，〈冬夜〉中的余崑磊教授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也有一些底層社會人物，如〈思舊賦〉中的幫傭順恩嫂等，就歷史時代而言，皆屬於舊社會的人物，白先勇也自言：

有些人批評我寫沒落的貴族，我覺得不是，我什麼都寫嘛。在「臺北人」裡，老兵有，妓女有，酒女也有，老傭人、老副官、上的、

---

<sup>22</sup> 王鼎鈞，《關山奪路》（臺北：爾雅出版社，2005年），頁434。

<sup>23</sup> 林懷民，〈白先勇回家〉，《驀然回首》（臺北：爾雅出版社，1980年），頁174。

<sup>24</sup> 白先勇，《臺北人》（典藏版），卷首頁2。

<sup>25</sup> 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頁9。

下的，各式各樣的人。……我並不是要讚美傳統社會的階級觀念，但以前就是這樣子。或舊社會，在新社會的眼光看來是罪惡重重，但是舊社會的人還是人，若說寫過去就不好，那麼，怎樣寫現代，現代也一樣會過去。<sup>26</sup>

然而正如柯慶明提到：「在白先勇小說中，『情慾』，往往與『流離』的情境糾結。」、「白先勇在小說中不僅表現了對於『流離』與『離散』前舊地的眷戀和懷念。」<sup>27</sup>綜合《臺北人》各重要篇章中人物、故事的歷史書寫特性，大約分為二類。

### （一）今昔對比的感慨

《臺北人》中的第一篇〈永遠的尹雪艷〉，充滿著現代傳奇的色彩，敘述尹雪艷是一個迷人、長保青春不老的神秘女性，但她卻是命中帶煞，追求她的王貴生傾家蕩產、最後甚至丟掉性命；而迎娶她的洪處長也在一年丟官、兩年破產，到臺北之後也無事可做。尹雪艷到臺北，住在仁愛路上的新公館，仍舊佈置得跟上海舊公館一樣華麗，客人皆有其身份地位。雪艷從中國大陸遷移到臺北後，日常生活仍不忘昔日的生活習慣，依舊常穿著上海風格的服飾，生活處處透露出過去上流社會生活的派頭氣息，朋友們喜歡到她的新公館裡，談談老話，大家都有一腔懷古的幽情，想一會兒當年，好像尹雪艷便是上海百樂門時代永恆的象徵，京滬繁華的佐證一般。尹雪艷又常帶著其他太太們買綢緞、繡花鞋，看紹興戲、又懂得京滬小吃：

於是這起太太們，由尹雪艷領隊，逛西門町、看紹興戲，坐在三六九裏吃桂花湯糰，往往把十幾年來不如意的事兒一股腦兒拋掉，好

---

<sup>26</sup> 白先勇，〈與白先勇談小說藝術——胡菊人白先勇談話錄〉，《聯合報》，1976年12月28日-29日，第12版。

<sup>27</sup> 柯慶明，〈情慾與流離——論白先勇小說的戲劇張力〉，《中外文學》卷30期2（2001年7月），頁24、頁33。

像尹雪艷周身都透著上海大千世界榮華的麝香一般，薰得這起往事滄桑的中年婦人都進入半醉的狀態，而不由自主都津津樂道起上海五香齋的蟹黃麵來。<sup>28</sup>

尹雪艷周旋於這些太太、老爺們之中，縱使生活過得氣派，卻也透露出在時空變異之下、今昔對比的感慨。故事中的尹雪艷，站在一個旁觀者的高度，看著這些受到時代牽累的人物。白先勇並非批判這些人活在過去，而是帶有同情的理解，希望更多人能有同理心了解這些人背後的辛酸。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金大班裡的金兆麗是歡場舞女，過去也曾經在上海百樂門做過頭牌明星，來到臺北後委身在「夜巴黎」舞廳，這最後一夜的思緒紛飛、變化無常，也正呈現了大時代底下小人物的今昔感慨。

## （二）重要歷史事件的縮影

〈歲除〉描述在除夕夜，劉營長家中來了一個客人賴鳴升。賴鳴升最早和劉營長結識，仍在四川成都當連長，如今到臺北，卻因個性耿直、不善交際而被除役，退休金還被一個女人騙走，只好回去當伙伕頭。當年青的軍官俞欣說到教官有教到台兒莊之役時，賴鳴升掀開衣服，讓大家看到他胸口的傷，開始訴說著過去參與戰役時的見聞，回憶到當年的事蹟：

日本鬼打棗澤——老子就守在那個地方！那些蘿蔔頭的氣焰還了得？戰車論百，步兵兩萬，足足多我們一倍。我們拿什麼去擋？肉身子！老弟。一夜下來，我們一團人不知打剩了幾個。<sup>29</sup>

酒酣耳熱之際，賴鳴升越說越起勁，說起當年跟著革命軍打孫傳芳的事，誇耀著自己「民國多少年，你大哥就有多少歲」。

〈梁父吟〉以第三人稱的敘事觀點，描述樸公參加王孟養葬禮後，與王孟養的學生雷委員在家中回憶過往。樸公、仲默和孟養三人是四川武備

<sup>28</sup> 白先勇，《臺北人》（典藏版），頁 55。

<sup>29</sup> 白先勇，《臺北人》（典藏版），頁 108。

學堂的同學，當年三人參加了同盟會，並且參與武昌起義。而樸公對孟養之子家驥所辦的喪禮感到很不滿意，樸公認為孟養的功勳，非比常人；〈梁父吟〉敘述三位革命元老的故事，白先勇取用《三國演義》的部份故事，以蜀漢英雄豪傑影射此篇小說中的人物。<sup>30</sup>三人原先各不相識，參加武昌起義時才碰巧規成一組，三人便在起義行動前夕，仿效桃園三結義歃血為盟。〈梁父吟〉，暗示三國故事中諸葛亮的典故；多少從諸葛亮復興漢室未果、鞠躬盡瘁的形象，影射反攻無望的遺憾。

〈國葬〉為《臺北人》書中最後一篇，將之放置於最後一篇有其歷史的鋪陳。以副官秦義方的角度書寫，其中靈魂人物為已故的李浩然將軍。白先勇以李將軍的葬禮表現對這一段歷史的哀悼，在李將軍身上，凝聚了一段歷史和秦副官的人生意義；正是在李將軍的葬禮中，交疊出人世的興衰與歷史滄桑。文中可以從葬禮的側寫，勾勒出李浩然將軍的不凡身份及其身後的歷史，祭文內容在描述李浩然將軍，集中華民國史蹟於一身，最後國共內戰失敗撤退來臺。〈國葬〉在敬禮聲中結束，象徵著對過去一段歷史的告別儀式，同時埋葬了李浩然將軍，也是對一個時代的最終宣告。

白先勇的小說創作中具有一股強烈的歷史意識，也是他對中國文學傳統的「歷史感」的歸納：對歷代興亡、感時傷懷的追悼，對古往今來、朝露人生的詠嘆，以及人世滄桑的蒼涼感、變幻不定的無常感。<sup>31</sup>舊時叱吒風雲的人事已不在，如今皆入到尋常百姓裡頭去了。白先勇的文字都是在歷史主軸上的不斷延伸，滄桑又悠長。由個人延及家國，無不是以文學形式的歷史想像，呈現的情景是一群人在臺北，心懷大陸，活在當下，回望過去以及尋問未來。白崇禧在民國時期，不論是抗戰或國共內戰時期，其角色都甚為重要，來到臺灣後則被冷落，白先勇處在這樣的環境下特別敏感，回望過去的殊榮與未來的無奈，可能是其最想書寫的情懷。

---

<sup>30</sup> 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頁 136。

<sup>31</sup> 劉俊，《悲憫情懷——白先勇評傳》（臺北：爾雅出版社，1995 年），頁 359。

《臺北人》中的「臺北人」，身在臺北而心繫大陸，從革命、北伐、五四、抗日、國共內戰，諸多歷史在這些「臺北人」的歲月中留下刻痕，此種運用歷史感的技巧，正是《臺北人》的特色，夏志清就認為：

《臺北人》甚至可以說是部民國史，因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時就有一度顯赫的歷史。艾略脫曾說過，一個現代詩人，過了二十五歲，如想繼續寫詩，非有一種「歷史感」(The historical sense)不可，白先勇也是在二十五歲前後(到美國以後)，被一種「歷史感」所佔有，一變早期比較注重個人好惡，偏愛刻劃精神面貌上和作者相近似的人物的作風。白先勇肯接受這種「客觀」的訓練，而且有優異成績的表現，表示他已具有創造偉大長篇小說的條件。<sup>32</sup>

白先勇在小說中透露出的情感，是緬懷過去、向著過去一段輝煌歷史所發出的嘆息。這是濃重的歷史關懷，他把父輩的滄桑，家國的命運和對人類的悲憫，一齊都融匯進去，漫延開來，貫穿下去。這股「歷史感」、兩岸分離的命運、民國從創建到撤退的變異，皆蘊含在《臺北人》故事中的各個人物上。透過這些人物所發展的情節，呈現了歷史時代中對命運的感慨。

白出身世家，雖經流離但絕非完全顛沛，雖然熱愛歷史但並非史學出身，如果將小說的場景或細節擺在歷史中進行考證，將會發現經不起太細的考證，如〈歲除〉文中談到1939年的隨棗戰役的一段，「日本鬼打棗澤——老子就守在那個地方」，當時的地名是棗陽非棗澤。〈一把青〉所談的空軍情況，似曾相似但又不完全符合當時空軍的規定。此外，所敘說的背景，大都以桂系的經歷為主，當然《臺北人》不會被定位在歷史的典籍，過於吹毛求疵，對於文學的經典而言不盡公平。

---

<sup>32</sup> 夏志清，〈白先勇論〉，《現代文學》期39（1969年12月），頁3-4。

然而值得討論的是流離情懷中的記憶問題，加拿大的民國史專家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於《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一書提到：「戰爭帶來破壞性極大，這個效應在戰爭結束後，通常還會繼續影響著人們，那就是家庭的離散。」<sup>33</sup>民國歷史最大的離散一是抗戰，一是國共內戰。過去歷史較重官方的文獻，往往忽略市民的歷史，底層的聲音無法透過書寫讓大眾追憶，近幾十年來，「口述歷史」的記錄與分析，在歷史學界成為一新興學術傳統，部分從事口述歷史的學者，也將之視為補充近現代歷史事實的利器。<sup>34</sup>此外，開始有更多人關注到社會不同層面的聲音，透過小說、歷史敘述、劇本等敘述多元文化的面貌。白先勇的小說關注到1949年前後來臺的這批「外省人」的生活點滴與感觸，這點是值得肯定的。

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些人如果是這批外省人記憶的寫照，要問一個根本的問題，誰在召喚記憶？是誰的記憶？這些來臺居住的大陸人，其主體位置雖有上流社會和底層之別，生活經驗各有所不同。然而又不約而同的有著「打倒共匪」、「打日本鬼子」、流亡等的共同記憶。除了這些之外，過往在大陸家鄉的過往記憶，其實是模糊的，《臺北人》將之召喚出來，時間好像是停滯、無法流動與推移。挖掘這些歷史記憶，與口述歷史不同，原因是白先勇不是在嚴謹的口述歷史場景中記下這些人的過往，即使是正規的口述歷史，正如唐諾·里齊（Donald A. Richie）認為：「口述歷史是訪談者與受訪者雙方共同參與製作的產物。」<sup>35</sup>經由口述歷史呈現出的歷史也有被刻意製造的問題，更何況沒有嚴謹口述歷史下的聲音去重塑歷史更是危險。臺灣近幾十年來已留下數量甚多的口述歷史或回憶錄，從官長到市井小民，每個人的過往都不同，對遷徙的印象亦不一，男女的記憶亦

<sup>33</sup> 戴安娜·拉里，《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臺北：時報文化，2016年），頁107。

<sup>34</sup> 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卷34期3（1996年9月），頁148。

<sup>35</sup> 唐諾·里齊（Donald A. Richie）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頁50。

不同，120 萬人的流離情懷確實不容易書寫。在這批人中有些人努力追索，有些人則選擇遺忘過去，個人際遇不同，一部小說當然無法涵蓋。然而，《臺北人》的貢獻是讓更多人關注這批「外省人」，透過白先勇生花妙筆，讓六〇年代出生後的臺灣人，有一份同情的理解。有理解才有融合，唯有經歷憂患的人才能寫出感人的作品，太過寫實的作品有時會顯得索然無味，或許這才是《臺北人》引起大家迴響的原因。

白先勇本人生活經歷概括為一個詞：即是「離散」，年幼時期流離在桂林、重慶、南京、香港等地，接著從大陸到臺灣，又從臺灣到美國；隨著自身的境遇，身分也歷經多重的轉變，這些都影響到他的創作，「臺北人」中的人物，也都歷經流離，每個人物的離散經歷與情懷雖不同，但確實反映多重漂泊、懷鄉與流亡的心境，這也是《臺北人》一書能引起廣大迴響的原因。林鎮山對「離散」的界定中提到：「飄零的『離散』人士，擁抱著不只一個以上的歷史，一個以上的時空，以及一個以上的過去與現在，還歸屬於此間與他地，又背負著遠離原鄉與社會的痛苦，成為異地的圈外人，而淹沒在無法克服的記憶裏，苦嘗失去與別離。」<sup>36</sup>這從白先勇的作品中確實反映許多「離散」的情懷。

### 三、《父親與民國》的親情關懷

#### （一）《父親與民國》出版的貢獻

《臺北人》是從歷史事實中虛構人物作為主軸，《父親與民國》則是從真實的人物及事實中進行敘述，多了一份真，少了一些美麗的幻想。白崇禧生前心繫反攻大陸，多次在白先勇面前吟陸游詩：「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白先勇在兩岸同步出版《父親與民國》，陸續於北京、重慶、武漢、南京、上海、桂林舉行新書發表會，彷彿重溯父親北伐抗戰的足跡；甚至在當年的南京總統府

<sup>36</sup> 林鎮山，《離散·家國·敘述——當代小說論述》，頁 16。

古蹟舉行白崇禧照片展，「我把父親帶回老總統府了！」白先勇認為，這也算圓了父親的心願。但在圓夢的同時，也有以下的重要貢獻：

其一，許多歷史珍貴的照片，這本書可以說是白先勇為其父白崇禧將軍編著的畫傳，全書收錄約 600 張白崇禧將軍的珍貴影像、報導剪影，並由白先勇撰寫圖說及一篇篇小故事。全書洋溢著深刻雋永的父子情，更有許多還原歷史現場的珍貴畫面與史實追記。該書發表後引起許多的迴響，齊邦媛等文學家都給予極高的評價。齊說：

拿到你的書稿，興奮得不得了，因為書中的那些照片，即使是我這樣一個見過那個時代的人，很多都沒看過。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那些照片是你家裡的收藏，原來外界不可能看到的。之前我聽說有六百張照片，我猜想當中一定有所謂的珍品，也就是永遠無法從別處得到的照片。所以那些照片真是寶貴呀。<sup>37</sup>

白先勇也一直強調照片會說話，許多的歷史敘說可能不如一張照片，這些照片中白先勇認為最不容易的是北伐時期，整整一本照片，可以彌補過去對北伐敘述及史料的不足。近年來隨著白先勇整理資料的廖彥博說：

如果白老師最膾炙人口的小說經典《臺北人》，是以文學描繪歷史的滄桑，《父親與民國》就是用真正的照片和文字，直書中華民國的歷史興亡。白將軍一生事業和民國的緊密關聯，透過白老師的選圖與文字說明，躍然紙上。<sup>38</sup>

其次，使用許多檔案、口述與回憶錄的資料，白先勇雖是文學家，但蒐集史料的用心不下一位嚴謹的史學家，過去學者研究桂系者不乏其人，

---

<sup>37</sup> 廖彥博整理，〈莫將成敗論英雄——齊邦媛 VS. 白先勇對談父親與歷史〉，《印刻文學生活誌》卷 8 期 9（總號 105，2012 年 5 月），頁 130-135。

<sup>38</sup> 廖彥博，〈白先勇的歷史「還魂記」〉，風傳媒，2015 年 12 月 11 日。

<sup>39</sup>但研究白崇禧者則較少，其原因即是資料的缺乏。有關白崇禧的資料最主要是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陳三井等訪問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sup>40</sup>另有一些文章及傳記。<sup>41</sup>研究白崇禧幾乎都著眼於桂系的發展。在許多人的鼓勵下進行撰寫白崇禧傳記，白先勇發現掉到無底洞裡，遇到很多困難，史料蒐集是其一。由於他在白崇禧十個子女當中排行第八，與父親不親近，1949年來臺才十歲左右，對於父親1949年以前的事情不清楚，甚至不知道父親與蔣介石的關係，因而花很大的力氣蒐集資料。白先勇除使用訪問紀錄資料外，也參酌秦孝儀等編的《蔣公大事年表長編》，甚至到國史館查證一些史料。

其三，帶動研究白崇禧的研究，由於《父親與民國》的出版，國史館、趨勢教育基金會、時報出版社等於2012年5月8日及5月9日假國史館舉辦《白崇禧將軍與民國》學術座談會，有呂芳上、齊錫生等發表專文探討白崇禧將軍的事蹟。<sup>42</sup>會後由《傳記文學》雜誌於2012年6月及7月

---

<sup>39</sup> 如譚肇毅，《新桂系政權研究》（廣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李培生編，《桂系據粵之由來及其經過》（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等。

<sup>40</sup>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

<sup>41</sup> 如陳三井，〈白崇禧與二二八事件〉，《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一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2年）；侯坤宏，〈白崇禧與二二八〉，《白崇禧與民國學術座談會論文集》（臺北：趨勢教育基金會、時報出版社、國史館，2012年5月8-9日）；張學繼、徐凱峰、徐付群，《八桂驍將——白崇禧》（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等。

<sup>42</sup> 會議由白先勇做《父親與民國》專題演講，分別由劉維開，〈從桂林到唐山——北伐時期的白崇禧〉、申曉雲，〈李白關係兼論三十年代的廣西建設〉、陳進金，〈蔣桂戰爭的前因與後果〉、李君山，〈桂軍共赴國難〉、楊維真，〈白崇禧與抗戰中期的軍事——以桂南會戰為例〉、張力，〈白崇禧將軍與1944年桂柳會戰〉、林桶法，〈戰後的蔣介石與白崇禧關係的探討〉、翟志成，〈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白崇禧與國共內戰〉、陳立文，〈白崇禧將軍與東北接收〉、侯坤宏，〈白崇禧與二二八〉、石永貴，〈白崇禧與回教〉、賈廷詩，〈白崇禧在臺灣的生涯〉、呂芳上，〈桂系在民國史上的定位〉、齊錫生，〈白崇禧與蔣中正四十年的合作與分離〉、陳三井，〈白崇禧在民國史上的地位〉等發表論著。

分別刊錄其內容，可以說是臺灣史學界第一次探討白崇禧將軍，大陸地區也舉辦了白崇禧與民國的學術討論會，有助於帶動白崇禧的研究。可能也會牽動其他人為家人寫歷史的強烈動機。其後廖彥博主筆，白先勇提供資料及補述，出了一本《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sup>43</sup>將二二八事件後白崇禧來臺善後的過程作詳細的介紹，是二二八事件的另一重要史料與論述，然而白崇禧僅止於安撫當時臺民的情緒，對當時二二八事件後續所帶來臺灣的悲劇並沒有多大的幫助。

其四，肯定白崇禧對民國的貢獻，由於《父親與民國》的出版，史學家重新檢視白崇禧在民國歷史的角色與地位，齊錫生認為：

在戰場之外，白崇禧對中國整個抗戰時期大戰略的制定，也作出了重大貢獻，諸如他所提出的集小勝成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等等一系列觀念，最後都被蔣介石全盤採納，成為抗戰的最高指導思想。<sup>44</sup>

陳立文認為：「白崇禧被稱為民國史上的『小諸葛』，其在運籌帷幄的能力絕不遜於軍事作戰，歷史不能以成敗論英雄。」<sup>45</sup>呂芳上指出：「白崇禧身為職業軍人，但絕不是老粗一個，與蔣一樣，除運籌帷幄，指揮作戰外，常讀兵法之書，亦精嫻韜略。」<sup>46</sup>這些都是對白的肯定。

## （二）出書的目的

白先勇費了許多心血蒐集及整理其父親的照片，其目的一方面追索其父親的過往，再方面凸顯其父親在民國的角色。該書共分二冊，上冊「戎

---

大部分收錄於《傳記文學》卷 101 期 1 及期 2，另林桶法的論著發表於《國史館館刊》期 35（2013 年 3 月），頁 81-100。

<sup>43</sup> 白先勇、廖彥博，《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臺北：時報文化，2014 年）。

<sup>44</sup> 齊錫生，〈白崇禧與蔣介石的合作與分離〉，《傳記文學》卷 101 期 1（2012 年 7 月），頁 79。

<sup>45</sup> 陳立文，〈白崇禧與東北接收〉，《傳記文學》卷 101 期 1（2012 年 7 月），頁 51。

<sup>46</sup> 呂芳上，〈白崇禧在民國史上的地位〉，《傳記文學》卷 101 期 1（2012 年 7 月），頁 86。

馬生涯」、下冊「臺灣歲月」，上冊分為四大部分：北伐、蔣桂戰爭·建設廣西、抗戰、抗戰勝利·國共內戰等，國共內戰是本書的第四部，也是篇幅最多的一部分，全書中作者用照片寫歷史，對讀者而言，猶如參觀白崇禧將軍與民國的主題展覽，導覽者正是其兒子，書中看到真誠與事實。國共內戰期間有許多珍貴的照片，如 1945 年 10 月 20 日蔣介石、宋美齡巡視四川敘盧。<sup>47</sup>1946 年 12 月 18 日，蔣介石、白崇禧、何應欽等至南京謁陵。不僅涵蓋國共內戰期間白崇禧的行腳，如出席國民大會（1946 年 11 月 5 日）、華北視察—北平行轅、視察軍事重鎮張家口、歸綏、山西太原（1946 年冬）、杭州笕橋檢閱（1947 年 5 月）等，除圖像外，並加以文字敘述，使讀者掌握當時的情境。

白崇禧戰後被任命為國防部長，雖然白曾一度拒絕，<sup>48</sup>但最後仍然就任，在處理國共戰爭上蔣介石與白崇禧有歧見，戰後國軍的復員上，白主張先解決中共後，再進行軍事復員，蔣則贊同陳誠的意見，先進行軍事復員。在四平街的戰略方面，白主張積極追剿，白將當時的情況向蔣報告，<sup>49</sup>蔣則不僅不贊同追剿，且在美國的壓力下於 1946 年 6 月 6 日頒布停戰命令。

白事後反省這次的事件認為：「杜聿明於哈爾濱停頓攻勢，整編軍隊，於共軍以喘息與反攻機會，大局遂漸予我不利，當時若長驅北進，直下東北，消滅林彪，而後抽兵入關內，如此於戡亂大局或稍有可改觀。」<sup>50</sup>以致後來國共內戰的失敗，對此白耿耿於懷，白先勇提到：

---

<sup>47</sup>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上冊，頁 198-199。

<sup>48</sup> 「白崇禧函蔣中正為專心往東北及各匪區所在地之國軍宣達鈞旨和視察請另選賢能任國防部長」，〈一般資料—黨國先進書翰（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檔號：002-080200-00620-021，1946 年 5 月 11 日。

<sup>49</sup> 「白崇禧電蔣中正我軍佔領新四平街並與杜聿明乘火車赴四平街視察明返瀋」，〈武裝叛國（一二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檔號：002-090300-00152-151，1946 年 5 月 20 日。

<sup>50</sup>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冊，頁 459。

父親一向冷靜沉著，喜怒不輕易形於色，但不止一次，我親眼看到他晚年在臺灣，每提起這一段往事時，猶自扼腕頓足，憾恨之情，溢於言表，我很少看到父親論事如此激動，即使論到徐蚌會戰另一個與他糾葛甚深的戰役，他也沒有像對四平街會戰感到如此痛心惋慨，四平街會戰最後竟功虧一簣，一著棋錯滿盤皆輸，這是父親一直耿耿於懷，到他晚年亦常引以為憾的一件恨事。<sup>51</sup>

白先勇還舉證蔣介石在《蘇俄與中國》一書中自我的檢討，及余紀忠（中國時報創辦人、戰後曾任東北行營政治部主任）提供白崇禧從南京發電蔣介石的電報，以證明「四平街會戰」時蔣未採納乘勝追擊的錯誤，余紀忠也對「四平」的遺恨，耿耿於懷。白先勇用了極大篇幅來敘述「四平會戰」，從其觀察言，此戰確實是白崇禧一生最大的憾事。從戰略的角度言，白的建議似乎比較合理，但東北的問題涉及美、蘇，不能僅從戰略的角度去評判，接受美國的調停雖感無奈，然而戰後的接收與復員都需仰賴美國，東北還有蘇聯的問題，確實讓蔣投鼠忌器。蔣認為此時對東北最好的策略是政治與外交，而非軍事行動，強調：「其途雖迂，其時雖緩，而實則比直接用軍事方式解決之效更捷更速。」<sup>52</sup>這就是為何蔣主張不乘勝追擊的主要原因，與白崇禧單純從軍事的角度出發自然大相逕庭。

此外，在戰略上蔣介石與白崇禧意見亦有分歧：1948年白調任華中剿匪總司令，駐節漢口，向蔣表示華中剿總的主要任務是保衛南京，並預測保衛京畿必將有一場決定性的惡戰，為此必先確定「守江必守淮」，建議將「華中剿總」設在蚌埠，俾能緊靠南京，在徐州蚌埠間江淮地帶，運用攻勢，堅持長期作戰，重要的是必須統一指揮，不能分割，五省（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江西）聯防才能有效部署軍隊。蔣將原先在黃淮平原一帶的兵力分為武漢剿總（白崇禧）與徐州剿總（劉峙），互不隸屬，又任命程潛為湘贛綏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駐守長沙，制衡白崇禧。白雖就

<sup>51</sup>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上冊，頁213。

<sup>52</sup>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6年6月29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任，但對於分權頗有微詞。<sup>53</sup>蔣則電示其遵照辦理。<sup>54</sup>其後白又舉證白崇禧在國共內戰中的一些事蹟。

《父親與民國》已點出許多問題，但仍有許多待商榷者：其一，過去革命史觀以國軍嫡系為主要考量，忽略其他非嫡系部隊的重要貢獻，不盡公允，然而此書以白崇禧及其桂系為主軸，是否也有偏頗之嫌？如戰後蔣介石與白崇禧關係為例，戰後白崇禧反對裁軍<sup>55</sup>，蔣贊同陳誠的意見進行軍事復員，立場不同，如果從財政的立場，不實施軍事復員似乎國家財政負擔更大。至於徐蚌戰役，白崇禧不就任徐州剿總，其原因甚為複雜，本書提到是因為對徐州部署的不滿才拒絕任命。<sup>56</sup>白先勇認為徐蚌戰役失敗，其父親是代罪羔羊。<sup>57</sup>事實上蔣介石在日記上對此事並未指責白崇禧。關鍵是增援不是就任問題，張發奎提到徐蚌會戰時，徐州局勢緊急，蔣想把桂系部隊從武漢地區調到前線增援，雖然武漢沒有險情，但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拒絕增援。<sup>58</sup>

其二，照片運用於歷史敘述中的盲點，此書的最大優點是豐富的照片史料，然有時照片只能補足史料的不足，不能取代歷史敘述的主軸，如有關李宗仁選舉副總統的風波，以幾張照片加上不到三百字敘述，實不足以讓讀者了解個中的複雜性，蔣介石與白崇禧恩怨的分界點主要來自副總統的選舉，蔣在 1948 年 4 月 30 日，反省當月時提到：

---

<sup>53</sup> 「白崇禧電蔣中正已飛抵漢口就任華中剿匪總司令職務」，〈領袖指示補編（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6-00002-231，1948 年 6 月 26 日。

<sup>54</sup> 「蔣中正電白崇禧華中與徐州軍事須統一指揮請兼顧華東對剿匪事無礙進行勿再言辭」，〈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七年（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34-110，1948 年 10 月 28 日。

<sup>55</sup>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上冊，頁 212。

<sup>56</sup>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上冊，頁 315-316。

<sup>57</sup>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上冊，頁 318。

<sup>58</sup> 張發奎，《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年），頁 451。

以余當時在中央全會提議應由本黨提簽黨員或黨外賢達為候選人之時，白崇禧即提問如提簽黨內究屬何人，此一問題實令余驚懼不敢作答。自國大開會以來，競選副總統之各人浪費金錢政治風氣與革命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尤其桂系之各種卑劣手段與要脅無所不至。<sup>59</sup>

本書對此僅有幾張照片，無法得知當時的一些變化。

其三，本書下冊「臺灣歲月」，提及白崇禧在臺的生活情況，其中有幾張與黨政要員的合影，如陳誠、宋子文、張群、葉公超等，可惜並沒有進一步論述其來龍去脈。本書對白崇禧在民國的角色，幾乎是仰角的關注，沒有一絲絲的貶抑。然而我們應用何視角閱讀本書，可能要回歸白先勇編輯該書的本懷，那就是向歷史交代及親族的關懷。白不是學院派的歷史學者，能將民國以來的歷史以桂系及白崇禧為主軸做線性的敘述已經相當不容易，其中提出的角度與觀點正是過去官方資料所欠缺者，加上珍貴的照片，確實補足過去對桂系的瞭解不足之處。廖彥博認為：「白老師還原歷史的工作，既是為父親、為民國，也是讓他父親當年在臺灣驚魂未定時的宣撫弭亂之舉，得以重見天日。白家父子兩代，文武殊途，但是都和臺灣這塊土地，結下深厚的情懷與緣分。」<sup>60</sup>

《臺北人》是小說作品，白先勇可以對書中的人物進行任何的雕琢，包括敘述這些「外省人」的離散情懷，可能表達的是白先勇接觸一些人的生活寫照，或許希望居住臺灣的所有人能多一份同情的理解。過了近二十年後，臺灣的政治環境有許多的改變，白先勇將自己拉到史學的現場，用照片寫歷史。整理史料重現歷史似乎是許多名將之後的共同使命，陳誠之子陳履安、女婿余傳韜，將陳誠的相關資料送至國史館保存，相繼出版《陳誠先生日記》、《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陳誠

---

<sup>59</sup>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8年4月30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sup>60</sup> 廖彥博，〈白先勇的歷史「還魂記」〉，風傳媒，2015年12月11日。

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等。胡宗南的兒子胡為真將重要史料出版《百戰忠魂——胡宗南將軍圖文傳》、《胡宗南先生文存》及《胡宗南先生日記》等<sup>61</sup>，白先勇出版《父親與民國》、《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等都有幾分相似的情懷——為先人留歷史，離散後的追憶等。也由於這樣的出發點提供珍貴的史料與觀點，對民國史的研究有極大的助益。

《父親與民國》出版後，雖亦引起一些人的關注，但並不如《臺北人》一書所帶來的迴響，其原因除了歷史場景緊扣在白崇禧在民國的事功，和許多人的生命無法強連結，另一方面以史料及照片為基礎，雖然佐證其父親白崇禧在民國史上貢獻，但故事性不強，激不起太多人的興趣。然而白先勇却願意花許多的時間整輯這些照片，這些照片確實勾起白先勇許多童年的回憶，同時也藉此再度肯定其父親對民國的影響，書名《父親與民國》讓史料與照片說話，多少有為來臺被冷落的父親抱屈之意。本書下冊的六部「家族親情」，論述家族成員，特別是對父母親的追憶與敬意，文中提到母親出殯的情況：「我覺得埋葬的不僅是母親的遺體，也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sup>62</sup>對於父親送機的情況體會甚深，亦頗為感觸：「那是我們父子最後一次相聚，等我學成歸來，父親先以歸真，月餘間生離死別，一時嘗盡，人生憂患自此開始。」<sup>63</sup>這又是另一個離散，這份濃濃的追懷，或許正是出書的重要原因。

---

<sup>61</sup> 《陳誠先生日記》（臺北：國史館，2015年）、《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臺北：國史館，2013年）、《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臺北：國史館，2009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臺北：國史館，2012年）、《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臺北：國史館，2006年）等。胡為真等編，《百戰忠魂——胡宗南將軍圖文傳》（臺北：中央通訊社，2016年）、《胡宗南先生文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6年）及《胡宗南先生日記》（臺北：國史館，2016年）。

<sup>62</sup>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下冊，頁251。

<sup>63</sup>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下冊，頁298。

#### 四、結論

經過國共內戰後政府撤退來臺，其實是許多人所始料未及者，戰後不論是軍隊的數量、武器的精良程度、統治地區或統治區的人數，政府都具有絕對的優勢，但國共內戰到後期，國軍漸趨劣勢，節節敗退，最後撤至臺灣。從 1945 年之後或 1949 年之後約有 120 餘萬人相繼來到臺灣，由於這批人居住集中於某些地區，語言不同於原來臺灣居住的居民，形成一個特定的群體，被稱為「外省人」、「阿山」、「芋仔」，他們在臺居住長達六十年之久，成為繼原住民、閩南人與客家人之後的住民，這些人只是來臺的時間不同，事實上都是臺灣人，經過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第二代之後已產生許多變化，許多方面與當時來臺的環境已有極大的差異，但他們的到來對臺灣文化、教育、社會、經濟等方面都帶來相當大的衝擊與影響，有些影響是立即，有些影響則是潛移默化。

外省人到臺灣雖有許多具體的貢獻，但最也衍生族群糾葛的問題，其實在中國各省都存在群族的問題，臺灣的族群問題因有其歷史與政治的因素，較被一般人所重視。中國各省從大陸撤退至臺灣約 120 萬人，直接立即的影響即是人口族群（ethnic group）結構<sup>64</sup>。移民者當然也希望獲得認同，然由於歷史因素產生許多不合諧性，族群衝突與融合成為臺灣變動的因子。<sup>65</sup>

雖然這批來臺的外省人與大陸情感上有強連結，但有許多人將外省人的國家認同簡化為「中國化」並不完全正確，這些人來臺的原因不一，來臺後的人生際遇大不同，這都影響其對「國家」的看法。由於來臺的「外省人」是臺灣「族群」的相對少數，面對改革的聲浪，危機感更為加強，

<sup>64</sup> 族群的概念源於西方的人類學研究社會實體的一種範疇分類，後來被延伸代表含有共同利益及一定連帶感的人，或指有共同特質與文化傳統的一個群體。

<sup>65</sup> 胡台麗，〈芋仔與蕃薯：臺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期 69（1990 年 4 月），頁 59。又見張茂桂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 年），頁 279-325。

有些仍然在堅守自己崗位繼續努力，有些則參加固定的活動「取暖」或參與抗戰等相關的研討會，他們努力證明過去的貢獻與價值，然而總是有失根的感覺，這種感受不是沒有經歷過離散者所能理解。

國共內戰國軍失敗後，有些將領轉進臺灣，這些將領有嫡系（如陳誠、胡宗南），有非嫡系（如白崇禧、孫立人），個人的機遇不同，有些繼續成為國軍的領導核心，有些則逐漸被邊緣化，甚至被看管。但他們沒有忘情於國家，正如白崇禧晚年仍念念不忘恢復大陸故土一樣。許多將領的後代各有發展，如顧祝同兒子顧福生是畫家，孫元良兒子秦漢從事演藝工作，吉星文兒子吉民立是跆拳道教練，發展不一，能為先人出版專書者並不多，其中較受關注的是白崇禧、胡宗南、陳誠。然而這批將軍之子，不論其流離中遭遇多少的苦痛，但畢竟是「幸運」的少數，即使有同理心也不能完全訴說絕大多數流難者的境遇。

白先勇的二本大作性質迥異，一是小說集，著重大時代一群人的際遇；一是歷史敘述，雖著重其父親個人的事蹟，實際上也是大時代的關懷；其脈絡是白先勇對時局變化與父親際遇的感懷，作者處於變動中，看到父執輩從大陸到臺灣的際遇，先以小說的方式呈現，集結許多人的共同記憶，書寫出許多人對故土的情懷與人生變化的無常。再以對父親在民國的貢獻，對比於臺灣時期的落寞，多少有些感傷，《父親與民國》或許不一定是為白崇禧的角色作翻案，因為白崇禧對民國的發展，其智謀、果決與反共的決心，一直以來都被肯定。但白先勇對於國共戰局的失利與父親來臺後未被重用仍感到有些許的扼腕。在白先勇《父親與民國》的序文中明白的提到：

國民黨在大陸上的失敗固然原因多重，然父親在他的回憶錄中，卻認定軍事失利是導致國民政府全面崩潰的主因，戰後父親出任首屆國防部長，其後又調任華中剿總司令，雖然身居要職，但職權受限，

並未能充分發揮其戰略長才，國共戰爭，國軍在戰略戰術上犯了一連串嚴重錯誤，終致一敗塗地。<sup>66</sup>

白先勇的小說創作中具有一股強烈的歷史意識，透露出的情感，是緬懷過去、向著過去一段輝煌歷史所發出的嘆息。這是濃重的歷史關懷，他把父輩的滄桑，家國的命運和對人類的悲憫，一起都融匯進去，漫延開來，貫穿下去。也是對中國文學傳統的歷史感的歸納，對古往今來、朝露人生的詠嘆，以及人世滄桑的蒼涼感、變幻不定的無常感。白先勇的文字都是在歷史主軸上不斷延伸，由個人延及家國，以文學形式，呈現出人在臺北，心懷大陸，活在當下，回望過去以及尋問未來的情愫。把《臺北人》（小說）與《父親與民國》（歷史）相互結合，那就是白先勇心目中一部真實的民國史。然而畢竟每個人的際遇不同，將軍之後的歷史記憶與離散情懷與一般大眾不同，張大春、張國立、苦苓等的作品或許可以看到更多、更真的離散情懷。

《父親與民國》是從真實的人物及事實中進行敘述，多了一份真，少了一些美麗的幻想，又加以有許多的照片做佐證，較具有真實感。白崇禧生前心繫反攻大陸，2012年白先勇在兩岸同步出版「父親與民國」，陸續於北京、重慶、武漢、南京、上海、桂林舉行新書發表會，彷彿重溯父親北伐抗戰的足跡。自從《臺北人》問世後過了二十年再度出版《父親與民國》一書，不僅是對其父親的追憶，白先勇重感情，對親人、對鄉里、對國族有一份濃濃的鄉愁與國愁，更重要的是對其父親一生的評價，雖其沒有特別提到「平反」，但從其在臺北、廣西、北京的新書發表會及學術研討會，全程參與，認真地與記者、學者、聽眾對話過程，確實能感受其對這本書的重視。

一個歷史人物，應該回歸到歷史的平臺上討論，白先勇不是史學家，但卻有卡爾（E. H. Carr）的精神，卡爾曾說過：「歷史是歷史家和事實

---

<sup>66</sup>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上冊，頁 10-11。

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去之間永無終止的對話。」<sup>67</sup>白在書寫《父親與民國》時確實不斷的交互比對，敘述父親的過去，讓所有人去檢視白崇禧將軍的功與過，除了了卻長期以來書寫的心願外，我們在書的封底中看到一段：「父親一生參與了民國的興衰，他本人就是民國史的一部分，在浩繁的民國史冊中，父親的身影應當立在相當醒目的位置。」<sup>68</sup>多了一份對父親事跡的信心與肯定，也寫出離散間的無奈。在大時代潮流的激盪之下，或許我們多一點同理心才能包容不同族群與不同派系的想法。白先勇的「離散」情懷，從個人對家鄉廣西的情感，擴大到整個大陸地區的緬懷，對父親的追憶，擴大到整個「外省人」的描繪，敘述時代的無奈，或許其所敘述的個案不能涵蓋大多數人，但白先勇所期待的是居住在臺灣地區的人民能同情的理解這批「外省人」在歷史洪流下的際遇。

---

<sup>67</sup> E. H. Carr 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91年），頁23。

<sup>68</sup>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封底。

## 徵引文獻

- 「白崇禧函蔣中正為專心往東北及各匪區所在地之國軍宣達鈞旨和視察請另選賢能任國防部長」，〈一般資料—黨國先進書翰（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20-021，1946年5月11日。
- 「白崇禧電蔣中正已飛抵漢口就任華中剿匪總司令職務」，〈領袖指示補編（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6-00002-231，1948年6月26日。
- 「白崇禧電蔣中正我軍佔領新四平街並與杜聿明乘火車赴四平街視察明返瀋」，〈武裝叛國（一二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檔號：002-090300-00152-151，1946年5月20日。
- 「蔣中正電白崇禧華中與徐州軍事須統一指揮請兼顧華東對剿匪事無礙進行勿再言辭」，〈一般資料—民國三十七年（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34-110，1948年10月28日。
- 山口守。〈白先勇小說中的現代主義——《臺北人》的記憶與鄉愁〉。《臺灣文學學報》期14，2009年6月，頁1-17。
- 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卷34期3，1996年9月，頁147-183。
- 王鼎鈞。《關山奪路》。臺北：爾雅出版社，2005年。
- 白先勇、廖彥博。《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臺北：時報文化，2014年。
-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臺北：時報文化，2012年。
-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臺北：時報文化，2016年。
- 。《臺北人》（典藏版）。臺北：爾雅出版社，2002年。
- 。〈與白先勇論小說藝術——胡菊人白先勇談話錄〉。《聯合報》，1976年12月28-29日，第12版。

- 呂芳上。〈民國史上的桂系：擴張型地方主義的思考〉，《傳記文學》卷 101 期 1（2012 年 7 月），頁 73-77。
- 李有成。《離散》。臺北：允晨文化，2013 年。
- 宋芳。《白先勇與太宰治作品中悼亡貴族情結的比較》。瀋陽：遼寧大學碩士論文，2014 年。
- 林桶法。〈戰後蔣介石、白崇禧關係的探討（1945-1950）〉。《國史館館刊》期 35，2013 年 3 月，頁 81-110。
- 林懷民。〈白先勇回家〉，《驀然回首》。臺北：爾雅出版社，1980 年，頁 165-178。
- 林鎮山。《離散·家國·敘述——當代小說論述》。臺北：前衛出版社，2006 年。
- 柯慶明。〈情慾與流離——論白先勇小說的戲劇張力〉。《中外文學》卷 30 期 2，2001 年 7 月，頁 24-33。
- 思兼。〈白先勇「臺北人」的世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卷 7 期 11（1974 年 11 月），頁 49-52。
- 胡台麗。〈芋仔與蕃薯：臺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期 69，1990 年 4 月，頁 107-132。
- 苦苓。《外省故鄉》。臺北：希代出版社，1988 年。
- 唐諾·里齊（Donald A. Richie）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 夏志清。〈白先勇論〉。《現代文學》期 39，1969 年 12 月，頁 1-23。
- 袁良駿。《白先勇論》。臺北：爾雅出版社，1991 年。
- 張大春。《聆聽父親》。臺北：時報文化，2003 年。
- 張茂桂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 年。
- 張國立。《戰爭之外》。臺北：印刻出版社，2016 年。
- 張發奎。《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年。

- 陳立文。〈白崇禧與東北接收〉。《傳記文學》卷 101 期 1，2012 年 7 月，頁 44-51。
- 華翔。《白先勇與喬伊斯的孤獨意識比較》。無錫：江南大學碩士論文，2009 年。
- 楊慧。《白先勇離散文學創作中的身分認同問題》。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
- 楊儒賓。《1949 禮讚》。臺北：聯經出版社，2015 年。
-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全 2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年。
- 廖彥博。〈白先勇的歷史「還魂記」〉。風傳媒，2015 年 12 月 11 日。
- 廖彥博整理。〈莫將成敗論英雄——齊邦媛 VS. 白先勇對談父親與歷史〉。《印刻文學生活誌》卷 8 期 9（總號 105），2012 年 5 月，頁 130-135。
- 齊錫生。〈白崇禧與蔣介石的合作與分離〉。《傳記文學》卷 101 期 1，2012 年 7 月，頁 78-81。
- 劉俊。《悲憫情懷——白先勇評傳》。臺北：爾雅出版社，1995 年。
- 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臺北：爾雅出版社，1983 年。
-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1945-1948 年。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 鄭樹森。〈白先勇「遊園驚夢」的結構和語碼——一個批評方法的介紹〉。《中外文學》卷 8 期 4，1979 年 9 月，頁 50-61。
-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臺北：天下雜誌，2009 年。
- 戴安娜·拉里。《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臺北：時報文化，2016 年。
- Carr, E. H. 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91 年。

## **From “People in Taipei” to “My Father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ook on Hsien-yung Pai’s Feelings of Diaspora**

Tung-Fa Lin \*

### **Abstract**

“People in Taipei”, written by Hsien-yung Pai, is a story about a group of people were forced to immigrate to Taiwan around 1949. Most of his books are literature. However, “My Father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was published in 2012, is not only stayed focus on describing his father’s personal deeds but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Great Era in China.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First, from “People in Taipei”, Mr. Pai has his unique perspective on experiences of Mainlanders fled from calamity, especially during the year of 1949. The Chinese Civil War caused those Mainlanders were forced to separate from their hometowns far far away. Being refugees, they never got a chance to return their hometowns again. Those who experienced discreteness owned particular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could represent the Great Era, too. These traits are reflected through Hsien-yung Pai’s works. Yet, those historical memories really belong to Hsien-yung Pai’s or just belong to the group of refugees’ are still worth discussing.

---

\* Professor and Chairm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Received November 28, 2016; accepted March 03, 2017; last revised June 06, 2017

Second, according to Hsien-yung Pai's works: "My Father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 can analyze the true meaning and realiz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ublished book. Mr. Pai is an emotional man with a strong sense of homesickness not only to his family and relatives but also to his country. Most important of all, to his father's lifetime criticism, he didn't even particularly mention about his father's "rehabilitate" case. Nevertheless, we still could feel the great impact on him. As you all know, from the whole conversation, Mr. Pai is seriously talking about this book with journalists, scholars and audiences at the new book representative. Furthermore, Mr. Pai will recommend the book to readers at the academic seminar in many places, such as Taipei, Guangxi, and Beijing. Needless to say, you surely can feel about the significant of the book by Mr. Pai himself. Through such kind of narration from "My Father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 do hope that readers can have empathy on the group of refugees who have experienced the historical tragedy.

**Keywords:** Pai Hsien-yung, Pai Chung-his, *Taipei People's*, *Father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Diaspora